

海外视野

马斯克的“丰裕时代”：高等教育将从职业导向转为存在导向

■郭英剑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26 年年会上,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与美国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的一场对话,吸引了全球目光,不仅因为马斯克首次现身这个他曾批评为“精英主义”的论坛,更因这场对话涵盖了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技术、可持续能源和太空探索等前沿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报道和多家媒体的记录,两人对话围绕着马斯克对未来“丰裕时代”的憧憬展开。在对话中,马斯克预测 AI 和人形机器人将“满足所有人类需求”,导致商品和服务极度丰富,全球经济爆炸式增长,甚至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对话中,两人都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一词,没有讨论学校体系、教学方法、大学改革或个性化学习。但在我看来,这场对话的深层含义却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示。这场对话潜在地挑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基础,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从“职业技能工厂”向“人类意义探索中心”转型的时代。

传统高等教育面临破产危机

对话中,马斯克强调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丰裕”,使人类进入“丰裕时代”或“后稀缺时代”。这两个词是马斯克在对话中反复强调的核心愿景概念,虽然他本人更常用“丰裕时代”或“可持续丰裕”表述,但两者本质上高度一致,可视为同义。

马斯克特别指出:“我们可能会在 2026 年底或 2027 年创造出比任何人类都聪明的 AI,到 2030 或 2031 年,AI 将比全人类集体智慧还强大。”他预言,在这样的世界中,“工作将成为可选择的活动”,因为机器人将处理绝大多数生产和服务需求。

芬克追问:“在那样的场景下,人类如何找到人生目标?”马斯克的回应是“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这一回应虽然简短,却点出了“丰裕时代”的核心,即物质满足后,精神追求将成为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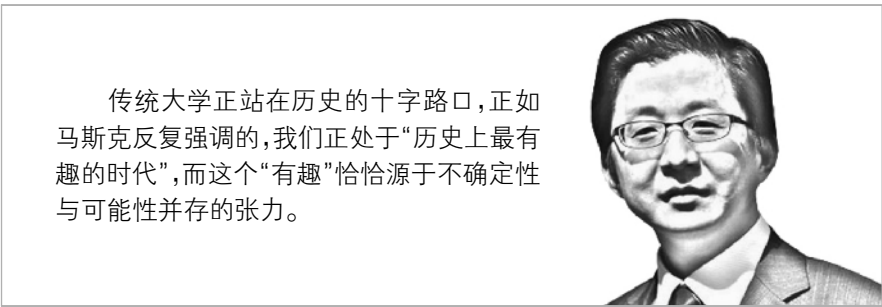
这些观点虽然未触及教育,但直接冲击了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为什么人们还需要上大学?在“丰裕时代”,以职业培训和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目前,许多大学依旧将自身定位为就业市场的入口,将专业技能、证书和起薪作为招生亮点。但马斯克的愿景颠覆了这一逻辑,在机器人主导的生产体系中,许多知识密集型工作将被自动化技术取代。马斯克预测,机器人将使“全球经济扩张”,这也意味着传统白领职业将变得稀缺。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大学再不能将“就业率”作为其核心价值。相反,大学需要重新定义自身,并从“技能提供者”转向“适应性培养者”。这要求高校必须尽快调整课程体系,融入更多关于 AI 伦理、机器人共存和可持续创新的内容。

AI 将使知识获取成本趋近于零

对话中,马斯克反复强调,AI 将使知识获取成本趋近于零,并表示 AI 将“本质上免费且无处不在”,任何人都能随时访问比全人类智慧和还强大的智能资源。



传统大学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马斯克反复强调的,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有趣的时代”,而这个“有趣”恰恰源于不确定性与可能性并存的张力。

这无疑直接挑战了大学的核心职能,即知识传授。传统高等教育依赖教授、教科书和课堂进行知识传授,但 AI 导师能提供个性化、即时且深入的学习体验。例如,一个学生想学习量子物理,AI 完全可以根据其背景实时调整难度,提供模拟实验和即时反馈,而且学生无需支付高昂学费。

这与马斯克在其他场合的观点一致。他曾在网络平台表示,学校未来更多是“社交场所”,真正的教学由 AI 完成。虽然对话中未直接提及,但其所说的“丰裕愿景”无疑隐含了这一转变:大学讲堂将变得多余,标准化考试和学位证书的权威性将逐步削弱。

这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迫使大学从“知识仓库”转型为“能力孵化器”。未来,顶尖大学将重点培养 AI 无法轻易复制的技能,如原创性、创造力、复杂伦理决策以及跨学科整合能力。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专业可能迎来复兴,因为它们强调人类独有的情感智慧和叙事能力。

另一方面,这也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机会。大学由此成为 AI 增强学习的平台,提供混合模式,将线上 AI 指导与线下讨论及实验相结合。当下,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一些欧洲大学已探索利用 AI 辅助教学,马斯克的预测将加速这一进程。到 2030 年,如果 AI 能超越人类集体智慧,大学若不适应,将被边缘化。相反,那些积极拥抱变化的大学将引领高等教育的新阶段。

大学可能成为“意义探索的中心”

两人的对话还涉及对“人类目的”的哲学探讨。

当芬克问及在“丰裕时代”下人类如何找到目的时,马斯克没有作出更深刻的哲学解答,而是用实用逻辑指出实现丰裕所付出的代价,即丰裕可能以牺牲某些传统“目的”为代价。比如,丰裕可能意味着人们不再通过劳动获得意义。但这个回答本身也暴露了问题的深刻性。

在无需为生存工作的世界里,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为什么而活”。这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潜在转型:从职业导向转向存在导向。

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大学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维度,将学生视为经济单元,而非完整的人格个体。但在马斯克描绘的未来,大学可能成为“意义探索的中心”。学生将通过课程探讨物质丰裕后我是谁、什么能带来持久满足、如何贡献于多行星文明等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转变并非空想。马斯克的太空愿景——使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以保护人类的意识,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新叙事。大学可以开发跨学科项目,如“太空

伦理与人类未来”,结合哲学、心理学和工程,帮助学生应对存在危机。这也呼应了马斯克的乐观主义,“最好在乐观中犯错,而不是在悲观中正确”。

高校可以通过这种哲学框架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以帮助他们应对职业变迁和社会结构变革。

目前,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其做法已初现端倪。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推出“未来研究”专业,探讨 AI 对人类目的的影响。但要全面实现还需要系统改革,包括减少行政干预、增加实验经费、鼓励终身学习模式。因为在“丰裕时代”,学习不再局限于四年制,而是持续一生。

短期阵痛下高等教育的适应策略

马斯克反复强调的“丰裕时代”并非一夜降临,而是要经历明确而残酷的过渡阶段。他多次警告:“接下来的 3 到 7 年将非常艰难。”其间,AI 和人形机器人将大规模取代工作岗位,导致社会结构剧烈重塑、白领失业潮、社会动荡加剧。

该预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 AI 指数级进步的理性判断。在 AI 超越单个类智能,直至超越全体人类智慧总和的过程中,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将远超新岗位的创造速度,知识密集型领域首当其冲。毫无疑问,这一过渡期的“阵痛”将对高等教育构成直接而严峻的挑战。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与电子教材平台 Kortex 合作发布的《2025 学生 AI 使用调查报告》,学生 AI 使用率已从 2024 年的 66% 上升至 2025 年的 92%。虽然该调查只针对英国本科生,但其数据在全球教育媒体和报告中被广泛引用,并作为学生 AI 使用率爆炸式增长的典型代表。

可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使用速度远超各个大学的响应速度,进一步加剧了过渡期的影响。为此,高校应立即采取行动,转而采取“快速适应策略”,否则必然被时代甩在身后。

一方面,要大幅增加 AI 投入,将 AI 从边缘工具升级为核心基础设施。美国在线与专业教育协会在《2026 高等教育预测报告》中指出,AI 将从工具转变为教育的核心运营基础设施。该报告预测,到 2026

年,许多高校将全面实施企业级 AI 策略,包括 AI 智能体。这些智能体能自主规划、多步骤执行任务,覆盖大学的各个领域。大学若不跟进,将面临“影子系统”风险。师生可能自行使用外部 AI 工具,并形成不受控的平行生态,从而削弱大学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探索终身学习模式是应对阵痛的核心路径。过渡期内,技能“半衰期”将急剧缩短,今天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在 3 到 5 年内就被 AI 超越。大学需从“四年制一次性学位”转向模块化、递进式、可复用的学习路径,支持成人重返校园、职业中期转型。

同时,大学应重视以“AI 流利度”作为毕业标准,要求每个学生掌握批判性使用 AI、识别偏见、伦理决策等技能。目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已启动全校 AI 流利度计划,目标是到 2029 年让所有本科生毕业时具备批判性使用 AI 的能力。这类举措正成为领先者的标杆。

在我看来,短期阵痛是马斯克丰裕愿景的必要代价,也是高等教育凤凰涅槃的契机。那些能在 3 到 7 年内转向 AI 核心基础设施、拥抱终身学习、平衡伦理与创新的高校,不仅能存活下来,还能成为“后稀缺时代”的引领者。反之,犹豫或固守传统者将在动荡中被边缘化。

可以说,过渡期的钟声已经敲响,高等教育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点亮未来的火炬

这场对话,以马斯克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饱含深意的话结尾:“我鼓励大家对未来保持乐观和兴奋。一般来说,为了生活简单,最好是做一名乐观者,即使错了,也胜过悲观者的正确。”

这句话并非“鸡汤”,而是马斯克朴素哲学的浓缩,即在技术指数级跃迁的当下,面对 AI 可能带来的失业潮、意义危机和社会重塑,悲观或许“正确”,能精准预见风险、避免失望,但同时也会成为一种囚笼,扼杀幻想与想象力,最终让人类丧失真正丰裕的可能性。

反之,乐观即使“错了”,也意味着我们选择了相信和尝试,选择了在过渡期阵痛中主动塑造未来。这种选择本身即为生活质量带来了更高的天花板。

对高等教育而言,这一观点尤其振奋人心。传统大学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马斯克反复强调的,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有趣的时代”,而这个“有趣”恰恰源于不确定性与可能性并存的张力。

因此,当我们回望这场对话时,不妨以他的结语作为高等教育的行动宣言:选择乐观,不是否认风险,而是拒绝让恐惧主导叙事。高等教育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学生都应以此为灯火,并在 3 到 7 年的痛苦过渡中勇敢重塑。乐观者或许会“错”,但他们至少在创造;悲观者或许“对”,却可能让整个文明停摆。

我认为,马斯克这句话不是盲目的乌托邦幻想,而是基于技术趋势的理性勇气。它提醒我们,高等教育从未像今天这样,有机会真正成为人类目的的守护者和激发者。

让我们选择做乐观者——即使错了,也远胜于正确地错过未来。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高校战略规划被视为一种高度理性的管理工具。目标是否清晰、任务能否分解、执行是否到位,构成了评价规划成败的主要标准。从学科建设到科研平台布局,从人才引进到资源配置,规划更多被理解为一份需要严格兑现的行动清单,其价值通过指标加以确认。

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以执行为中心的规划逻辑,确实为高校实力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进入“十五五”时期,这一前提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高校所面对的环境不再是通过线性推演就能把握的单一场景,而是由技术路线跃迁、国际制度博弈和国内结构性约束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前沿科技领域在短周期内出现方向转换,高层次人才流动深受地缘政治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与财政增长约束同步显现。

由此,一个看似非常却日益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高校战略规划即便被高度忠实地执行,也未必能引导高校长期有效地发展。

当“正确执行”成为风险来源

传统高校战略规划往往建立在一个隐含前提之上:未来总体上可预判,只要在规划初期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通过制度化手段严格执行即可。基于这一逻辑,规划失效通常被归因为执行不到位或落实不充分,而较少回到规划假设本身加以反思。

当不确定性由偶发扰动演变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征时,这一判断便开始显露其局限性。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往往领先于规划修订与制度调整的节奏。一旦方向假设出现偏移,规范的执行机制反而可能会放大早期判断失误,使高校锁定在一条逐渐失效的发展路径之上。

国际一流大学的实践,正是对这一风险的现实回应。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哈佛大学高度依赖校产基金收益支撑学术扩张的模式遭遇冲击。若继续按照既定规划推进建设与投入,财务波动可能被制度化放大。于是,校方在规划周期中主动调整建设节奏和资源配置结构,其核心考量并非执行能力不足,而是避免“机械按计划推进”加剧系统脆弱性。

类似逻辑也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并未等待原有五年规划自然收官,而是在周期尚未结束时,对教学组织模式、科研协作机制和国际合作安排作出系统性修订。这些调整并非源于规划执行失灵,而是基于对继续沿原路径推进可能带来长期不利后果的判断。

从执行理性到生成理性

高校并非目标高度一致、行动路径单一的组织,而是由学院、学科、科研团队和个体学者构成的多中心系统。不同主体在学术取向、资源需求和发展节奏上的差异,使高校内部长期存在多种规划逻辑与行动方向。若战略规划被设计为高度线性的执行路线,往往难以覆盖真实而复杂的学术活动。

在实践中,这种结构性张力通常以两种方式“化解”。一种做法,是在执行阶段不断对规划目标进行技术性调整,使其表面得以完成,但实质内容持续被稀释;另一种做法,则要求具体行动严格围绕规划文本展开,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优先服务于指标完成度,而非学术探索本身。前者削弱了规划的方向引导,后者压缩了学术创新的弹性空间。两种路径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却都会削弱高校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高校战略规划亟须引入一种不同于传统执行逻辑的理性形态——生成理性。与执行理性强调“事前设定目标—事中严格执行—事后对照考核”不同,生成理性关注高校是否具备在不确定环境中持续调整判断、修正路径的制度能力。它并不试图在规划初期作出完整、确定的预判,而是通过制度安排为后续决策保留修正空间。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长期实践清晰体现了这一差异。该系统并未要求各校区严格遵循统一的发展指标,而是借助周期性战略评估与校区定位机制,引导不同校区根据学科基础和外部环境变化动态调整发展重心。

面向“十五五”,高校战略规划可参考以下 3 种现实转向。

第一,把“定目标会议”前移为“风险与机会研判机制”。笔者在调

『十五五』高校战略规划如何避免被『正确地』淘汰？

■赵志强

研中发现,多数高校战略规划往往从校级层面集中讨论发展目标开始,随后由职能部门分解任务。此种流程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环境中,容易从一开始就固化判断。更具生成理性的做法是,在正式设定目标之前,引入一个制度化的“风险与机会研判阶段”。规划启动之初,可由发展规划部门牵头,联合学科建设、科研、人事和财务等部门,围绕 3 类问题形成基础判断:哪些学科方向正在加速演化,哪些既有布局可能面临路径锁定风险,哪些新兴领域仍处于投入与产出高度不确定的窗口期。

第二,把“全面铺开改革”改为“带退出机制的制度试验”。在治理改革和评价改革中,不少高校仍倾向于通过一次性方案整体推进。这种方式在方向判断准确时推进迅速,一旦环境或组织响应出现偏差,修正成本往往极高。“十五五”时期,更具生成理性的路径是,将改革明确设计为可撤回的行动试验。规划文本可直接区分为“全面实施事项”和“试验性事项”。对于后者,应同步明确试验范围、试验期限和退出条件。例如,在科研评价改革中,部分高校允许少数学院率先采用长周期考核或代表作评价,并在两到三年后根据科研产出结构、团队稳定性等指标决定是否推广。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在学部制改革和科研组织方式调整中,均通过分阶段试点逐步推进,而非一开始即在全校铺开。这种设计使规划从刚性承诺转变为制度学习过程。

第三,把“规划评估”嵌入年度决策,而非事后验收。传统规划评估多集中于中期或后期,主要用于判断规划目标“是否完成”,纠错功能有限。生成理性要求将评估前移,使其直接参与下一轮决策。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可通过 3 类常规分析实现这一转向:年度学科生态变化分析、科研团队活跃度与稳定性分析、高层次人才流动结构分析。这些分析不用于排名或问责,而是作为年度经费投向、平台建设和岗位设置的重要参考依据。部分高校,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在内部预算分配中引入类似机制,根据学科科研结构变化动态调整支持方式,而非机械对照既定规划指标。评估由此不再是规划的“终点”,而是持续校正方向的起点。

进入“十五五”时期,高校战略规划的关键应逐步从文本质量转向制度弹性。生成理性强调的是把不确定性视为规划运行的常态,使规划成为支持判断更新和路径修正的制度安排。当变化出现,高校能够及时校准方向,而不被既有蓝图所锁定。是否会被“正确地”淘汰,取决于高校是否持续保有转向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嵌入治理结构之中。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刘虹

中国大学评论

优质本科扩容的底层逻辑

■刘虹 张端鸿



张端鸿

人才结构与教育质量的系统性安排。

正因如此,理解“优本”的内涵至关重要。优本扩容的底层逻辑并不在于扩大“本科”的学历层级本身,而在于稳住和加固支撑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的人才能力底盘。无论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真正稀缺的都不是完成 4 年学习后拿到的毕业证,而是具备扎实基础、良好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的本科毕业生。

但在实践中,“优本”极易被压缩为“名校”。原因很简单,本科培养质量高度依赖过程,课程体系是否扎实、教学投入是否充分、学生体验是否良好,这些关键变量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并不透明。相比之下,学校层级、录取分数线和历史声誉则更容易被感知和传播。于是,优本扩容在社会心理层面被自然理解为“好学校多招一点人”。问题在于,一旦这种理解固化为政策执行的逻辑,就会使优本扩容从“质量型供给增加”滑向“身份型资源倾斜”,从而偏离其最初设定的结构性目标。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本科教育质

量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专业层面,并且这种差异通过长期演化逐步显现。一个专业如果在录取分数、培养过程和就业结果等多个维度上持续表现良好,往往会在校内资源配置中自然获得优势,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更强师资力量、更高平台支持和更稳定制度投入。这并非单一行政决策的结果,而是学生选择、教师投入、学院治理和用人单位反馈等多元主体分散博弈、长期互动的产物。换言之,真正的优质本科专业不是“被认定出来的”,而是在持续表现中被反复验证形成的。

正因为“优”来自自然的演化和验证,如果简单画一个圈来确定谁是优本,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刀切”。出于公平与可操作性的考虑,倾向于确定一个清晰、统一的政策范围在许多公共治理领域是必要的,但本科教育质量恰恰是一种高度依赖过程、难以被静态刻画的结果。一旦“优本”成为一种行政身份,博弈重心就会前移至评选门槛,专业建设的动力也可能从长期育人转向短期达标。更深层的风险在于,身份一

旦固化,原本由质量驱动资源、由资源反哺质量的内生机制就会被削弱。

因此,优本扩容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划出一个谁是优本的圈子”,而是能否建立一套持续起作用的激励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应是将政策重点从“认定谁是优本”,转向“怎样让办得好的专业持续获得回报”。在这样的机制下,优本不再是一个静态标签,而是一种动态结果。真正决定是否扩容、扩容多少、向哪些专业扩容的,则是专业在录取质量、培养过程和就业结果等方面的长期表现。

归根到底,优本扩容考验的不是招生计划调度能力。如果优本扩容最终被操作为名校扩招、重点高校扩招,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部分焦虑,却难以改变本科教育供给结构。只有当“办得好”的专业能够在长期表现中持续获得回报,优本扩容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本科教育提质增效的制度工具。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